

论大学与边疆文化

孔含鑫

(云南民族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大学与边疆既是不同文化接触、交流及其贮存区域,又是带有混合力量的新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带。而以多元文化的视角观察,就会发现大学与边疆都是基于不同人群(族群)汇聚之后的一种文化自由混合地带,是一个包容混合各种文化的过程,而调和与中道则是大学与边疆文化自由生态发展的普遍原则。

关键词:大学;边疆;文化交流;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053-03

University and the Frontier Culture

KONG Han-x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Yunnan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Universities and the frontier are the places for the different cultural contact, exchange and storage on one hand, and the zones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born culture with mixed power on the other. However, both universities and the frontier are the free mixed cultural zones for the gathering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which are the process to contain and mix all kinds of culture, with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of the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for the free and ecological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frontier; cultural exchange; multi-culture

科林·卢卡斯说:“大学之存在,是为了探究事物的本质;大学之存在,是为了发现如何区分真实与表面真实;大学之存在,是为了理解意义。”^[1]梅贻琦则指出大学是教化的重镇、国家文化的中心和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的汇聚点。^[2]在美国等“边疆国家”的文化传统里,“边疆”指的是人类定居区域的边缘地区。同时,因边疆地带一般有土著居民的存在使得“边疆”成为文明与蒙昧、蛮荒的交织,即边疆又是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区域。^[3]

东方韩愈指出师者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西方海德格尔也指出大学在于解惑、除弊、澄明德性。纽曼则指出大学是传播普遍知识的场所。而普遍知识的教学也是不同文化的融合过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博学(爱),其实是一个包容混合各种文化的过程,而这种混合文化最终促进了边疆族群的融合和团结进步,使世界和平和国际对话成为可能,并最终促使人类的共同进步,达到至善。

中国是一个边疆国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并重点向农

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治国理政、稳藏兴边的重要战略思想。而自元代以来,历代固川保藏、经营川边、筹建行省等颇具成效的治藏兴边经验,均突出文化软实力。方铁老师最近撰文指出,中原王朝治理边疆施用的文化软实力,元明清以前治边文化软实力的载体是封贡制度,传播的机制是文化传播。元明清以后,天下形势与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和传播载体等都发生了变化。^[4]

因此,在十八大开启的新时期,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就必须对边疆以及大学与边疆族群教育有深入的了解。本文尝试从多元文化的视角论述大学与边疆的相通之处、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大学与边疆都是不同人群(族群)汇聚的地带

11世纪之前,修道院和僧侣把持着西方知识源流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阿拉伯文化,此后随着文化的勃兴、农业的发展、商业的复兴、城市的兴起以及边疆的开拓,一群求知的人逐渐聚在一起,虽然没有固定场所,没有基本的教学设施乃至没有教材图书,但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群的聚集则形成了大

收稿日期:2014-05-22

基金项目:云南民族大学人才科研项目、云南民族大学学术带头后备人才项目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孔含鑫(1974—),男,安徽安庆人,副教授,硕导,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边疆教育及宗教学研究。

学最本初的形态和基础。这些最初的学校,或有名师巨匠任教,或在神学、法学、医学方面享誉威望,或地理环境优美、交通位置优越、商贸旅游发达,同时又因得到政府当局或宗教神权的承认和庇护而不断吸引人群的汇聚。此后,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人群的汇集交流,这些因素促使了现代大学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边疆地带同样是不同族群的汇集区域。张博泉教授曾指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先后经历了秦以前的“前天下一体”、秦汉到隋唐的“天下一体”及辽宋金的“前中华一体”和元明清的“中华一体”这样的两个时期四个阶段。^[5]在秦以前,虽然孔子将族群分为“诸夏”和“夷狄”,但夏商周以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诸夏和夷狄族群不断向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聚居,因此,诸夏夷狄苗蛮等族群都是汉民族的重要构成,而秦灭六国以后,以汉族群为核心在中原地带形成一个各族群汇聚共存的一体局面,与此同时,长城以北也出现了一个以匈奴族群为核心的族群汇聚的局面。随着中原农业的发展,从汉武帝开始,汉族沿长城大举向西汇聚,如在甘肃西部设置敦煌、酒泉、武威、张掖等河西四郡,并将28万汉人移入该地区居住。这条黄土高原通向天山南北的孔道,逐渐成为乌孙、月氏、匈奴、羌族及具有复杂血统的汉民族等中华古老族群的汇集地带,其时的边疆地带就此形成。汉魏至西晋末年,在黄河流域及巴蜀地区出现了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建立的诸如“十六国”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少数民族又大量进入汉族传统居住区域,这种族群杂糅式的多向度汇聚和文化交融为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结束以及隋唐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唐宋五百年间,各边疆原住民族群与中原族群不断多向汇聚融合。北宋时期,北方的女真部族灭辽和北宋,将疆域向西扩张,直至与西夏连接,向南到达秦岭淮河与南宋接壤。辽宋金之后,蒙古族先是在北方建立统一政权,在向西挺进征服西亚后,经甘肃、四川、云南等地,沿长江南下,最终建立一个包括回汉蒙满族群在内的统一政权。嘉道以后,龚自珍提出“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6]。元、清朝的空前统一在促进边疆族群进一步融合的同时,也促进了不同族群的文化交融与共存发展。

派克指出:“中国就是这一种有机体。在它悠久的历史中,逐渐生长,并逐渐扩张其疆域。在此历程中,它慢慢地、断然地,将和它所接触的种种文化比较落后的初民民族归入它的怀抱,改变他们,同化他们,最后把他们纳入这广大的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复合体中。”^[7]1934年,庄学本在“开发西北”的号召下前往阿坝草原、果洛草原等西南边疆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考察后,感慨“如果思想如汉人的敏慧,身体有土民的壮健”的族群交融共存工作能普遍地推

行,“二十年后定有一批精壮敏慧的新民族出现”。^[8]这种美好憧憬蕴含着文化多元视觉与边疆族群和谐交融发展的期待,也启示我们边疆与大学在促进不同人(族)群汇集这一点上的相通性。

二、大学与边疆是文化自由混合的地带

影响现代大学产生、发展及高等学术复兴不可或缺的两因素为: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二是中世纪基督教的作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理性自由、思想自由是大学学术自由根源所在,希腊人使世界上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而宗教是西方世界道德观念的来源,是西欧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文明之间的传递者,为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和现代大学的出现提供了文化血脉。

概括起来说,希腊人的思想自由或自由思想的成长,得益于民主政治的城邦、思想自由的智者以及宗教的世俗性。在希腊思想发展的末期,基督教改变了罗马人的信仰,基督教发展的初期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普通大众,并依靠自由的原则获得生存的势力。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在实现信教自由的同时,也促进了现代学术自由的发展。在传统宗教机构或大学中,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是学术自由的历史基础。原因在于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清除了教权和国家对于学术自由的控制,这也表明了学术自由和宗教自由的统一性。1694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以哲学自由作为理念,建立哈勒大学,将大学从中世纪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并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使大学成为真正的探究真理的中心而具有自由精神。

虽然孔子用周礼来区分华夏与夷狄、中原与边疆,但“中国失礼,求之四夷”又表明华夏与夷狄文化的同根同源性。荀子对各族群之间的这种文化同一性认识尤为深刻,他指出这种天下一体的文化同一性使得各族群自觉归附融合。汉唐时期,在文化上视中外为天下一体,唐太宗认为中华夷狄如一。发轫于唐代的多族群一体思想,经辽宋金的发展,至元代而成多族群的中华一体文化格局。因此,边疆各少数民族虽然在自然生态环境、宗氏族源、先祖传说、血缘递承、神话历史和原始宗教文化等方面都与中原汉族相异,但边疆各少数民族及汉族都在创立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相互关联。中华民族是各边疆族群和汉族共同向边疆地带汇聚而成的结果,边疆族群的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族的农业文化共同凝聚为中华民族意识,而这种混合的力量来自不同族群汇聚的边疆(地带)。

历史上,无论是边疆族群还是中原汉族,血缘和文化的融合从未间断。各边疆族群在融合的同时,既保留了本族群文化,对他族群文化亦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在大学或边疆这种不同制度和不同文明汇集和混合的地区,不同的族群可以彼此学习而又不

至于完全受制于他者,因而可以在自由的交融发展中和谐共存。

三、大学与边疆都遵循调和、中道的原则

古希腊的思想自由是现代大学自由的思想源泉,也是学术纯理性的根基,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除了刻着“认识你自己”的名言外,还有“万事切忌极端”的调和及中道思想。古希腊思想自由是希腊好学、创新、爱好人文、中庸以及爱自由等精神的体现。^[9]

“和谐”与“合度”的概念很早就出现在《荷马史诗》中,毕达哥拉斯学派指出宇宙的基调是平均、秩序与调和,德谟克利特认为适中是最完美的,亚里士多德视中庸为美德。古希腊的中庸、调和及平衡等生态文明思想“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0],古希腊人在思想自由之中,又理性地保持中庸、调和之道,正是这种适度的把握,使得古希腊文明成为现代大学的指路明灯和智慧之源。大学是不同族群和文明的汇集之地,又是本着纯粹学术研究的理性所在,无论是在现实的世界还是精神的领域,大学无时无刻不处于“边疆”位置,大学连接着理想与世俗,大学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大学能否在这样的“边疆地带”生成新的带有混合力量的文化,只有这种新的带有混合力量的文化才能既深入世俗社会,又引领大学趋于崇高。

借用布迪厄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中心与边疆实际是具有不同惯习的不同场域。这些不同惯习的场域都是由各种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所组成的系统。因此,每一个场域都因具有自身特有的理论逻辑和客观规则而具有外在的相对独立性和自由发展度。而“惯习”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是人的社会行动、生活风尚、行为规则等实际表现及其精神方面的总根源。惯习产生于历史中,既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也是社会分类和等级化的原则。人们通过惯习的外在表现形式——气质、风格、个性、生活方式等,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强调从族群成员资格的自我主观认同和他者归类去认识族群。换句话说,族群认同不仅是族群成员的自我认同,也必须有边疆文化之外的他者的认同,并且只有这两方面的认同趋于一致时,族群的边界才会出现。因此,按克里福德·吉尔茨的看法,场域性的惯习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中心族群与边疆族群都是相对独立的场域,而影响各个族群的边疆文化则是具有地方性知识特性的族群文化。

同时,整个社会实际可以看成是由具有各种惯习的小场域组合而成的,中心与边疆之间、边疆与边疆之间,大学与周围社会之间以及各个大学之间都可视为的不同场域,这些相对较小的场域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社会空间,并且彼此

之间互相作用。这些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示着各种传统的文化力量以及新的适应性的文化的生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若坚持多元文化视觉和自由原则,族群文化冲突甚至是民族矛盾都是可以理解的,大学中学术权益与世俗权益之间的冲突也就顺理成章。

但是,社会毕竟是由不同的社会群体及社会关系交织而成。“如果征服者想把自己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强加于一切民族,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11]因为“人类对自己的法律和习惯是不可思议地依依不舍的;每个民族都因自己的法律和习惯而感到幸福快乐”。^[12]就社会而言,每个场域、每个族群都极力保持自己的惯习,族群成员也乐于享有本身的惯习。“通常来说,在一起生活比各自生活对个人更为有利,保持(个人间的)结合,就是保持已有的生活条件。”^[13]而按孔德和斯宾塞关于社会结构范式的理论逻辑理解,社会(或族群)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在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里,个人习得服从于合作经验,克服利己主义倾向,学会为他人而生活。换句话说,保持各种场域的稳定性的决定性取决于在分清各种场域的特殊性和传统性,保持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协调适应性。

在族群通婚的研究中,王桐龄先生观察到无论是在全盛还是衰败时期,汉族对于与他族群通婚都没有限制。他将这种原因归结为汉文化喜平和,尚中庸,不极端激进。^[14]吕思勉先生也指出汉文化根底深厚,用克兼容并包,同仁一视。^[15]⁸基于汉文化这种中庸、调和的观察,吕思勉先生进一步指出,北方游牧民族在边疆地带对农业社会汉文化的接触和吸收,是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强盛的重要原因:“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致之……若其所居近塞,乘中国丧乱之际,能多招致汉人,则其兴起尤速。突厥、契丹,其最著者也。”^[15]⁹³但“从文化的本质上看,世界上决没有完全封闭的文化。文化是人类群体指导自己行为和行选择的一套标准体系,表现了人们适应和利用自己周围环境的能力。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力求扩展自己的行为能力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他不能完全拒绝一种先进和进步的外部文化。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东挪西借而凑成的一个文化百衲衣”。^[16]因此,在边疆地带发挥作用的既不是农业社会的文化,也不是北方游牧社会的文化,而是这两种文化混合而成的多元的新文化,这是边疆调和、中道原则的体现。

大学与边疆汇聚了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人群,是不同场域与惯习的交汇,因此,要想维持大学或边疆的和谐稳定,坚持调和、中道原则,保持多元文化的平衡发展与文化生态环境是关键。

(下转第60页)

路”观光生态精品旅游线路。

其次,文化产业要发展。完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利用丰富、浓郁的传统民族文化底蕴,整合和挖掘区域历史文化资源,扶持发展文化旅游业、创意产业,构建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积极推进滇东北特色苗族村寨建设,保护庙口古渡、庙口石牌坊,建设苗族博物馆、苗族文化广场、苗族街,推出一批以民族风俗、民族歌舞、地方文化为特色的旅游表演项目,打造一批文化旅游精品,实现“文化搭台、旅游唱戏”,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3. 做大商贸物流

充分利用水富立体的交通优势,以口岸为依托,促进商贸物流的大发展,实施好《云南省水富物流中心发展规划(2009—2020)》,及早将水富打造成滇东北长江上游水陆联运物流中心、水陆交通枢纽、滇东北货物集散和区域物流中心、长江上游重要口岸。

第一,推进商贸物流中心建设。重点建设水富港口二期扩建工程、枫叶国际批发市场三期工程、水富火车货运站改造和水富物流仓库建设等项目,抓住国家一类口岸的申报建设、向家坝水电站建设和长江航运改善等契机,全面提升水富港通航条件,构建辐射周边区域乃至成渝的现代物流网络,着力打造“现代商贸物流集散中心”。

第二,完善城乡物流体系。以“特色街(区)”为重点,建设一批符合商业网点布局、规模大、档次高的商业设施。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流通企业实行强强联合,进行跨行业、跨区域发展,切实培育重点流通企业做大做强。以“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为着力点,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重点建设水富县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充分发挥“两社一会”(村级综合合作社、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流通协会)的桥梁作用,推进乡村流通工程建设。

第三,创新现代经营模式。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培育一批集信息发布、价格指导、网上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行业门户网站,鼓励电子商务与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相结合,推进商贸物流业现代化,促使传统商贸物流业经营模式向现代经营方式转变,积极拓展连锁经营,按照标准化超市、便利店等方式改造传统小型零售铺。

4. 发展港口经济

根据国家交通部航道整治规划,到 2020 年,长江干线航道得到全面、系统治理,航道通航能力较大提高,通航条件明显改善。水富到重庆长江干线航道要达到三级航道标准,通航由 1 000 吨级驳船组成的船队。结合小南海、朱杨溪等枢纽建设,可将航道标准提高到一级,届时,3 000 吨级船舶可从水富港沿江而下,直达上海,水富港将真正成为长江“第一港”。

要加快水富口岸保税物流区建设,提升水富港服务功能,大力发展临港经济。建设水富港口物流工业园区,配套建设水富港、物流配送中心、海关口岸设施以及包括云天化现有厂区和扩建用地在内的重化工生产企业,形成港口、物流和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组团布局,为港口经济发展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在现有港口一期扩建工程完成的基础上,加快水富港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并按照水富港总体规划加快港口泊位、后方堆场、仓储设施、对外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积极申报国家一类口岸建设项目,把水富建成云南最大最规范的内陆口岸。

【参考文献】

- [1] 水富县统计局. 水富县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4-01-20]. http://xxgk.yn.gov.cn/Z_M_003/Info_Detail.aspx?DocumentKeyID=1BA07CCBF3EF483A81A2B947D80ECE36.
- [2]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云南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 2014 云南领导干部手册[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上接第 55 页)

【参考文献】

- [1] 科林·卢卡斯. 21 世纪的大学[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2(5): 37-50.
- [2] 梅贻琦. 大学一解[J]. 清华学报, 1941, 13(1): 1-12.
- [3] 范可. “边疆发展”献疑[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1): 1-7.
- [4] 方铁, 黄禾雨. 论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3(2): 19-31.
- [5] 张博泉. “中华一体”论[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6(5): 1-12.
- [6] 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 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05-111.
- [7]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社区与功能: 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8.
- [8] 葛莉. 庄学本: 被遗忘的大师[J]. 中国民族, 2010(7): 48-53.

- [9] 罗念生. 希腊精神[M]. 北京: 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 1943.
- [10]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14.
- [11] 孟德斯鸠. 罗马盛衰原因论[M]. 婉玲,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41.
- [12]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下册[M]. 许明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196.
- [13] 周晓虹.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72.
- [14] 王桐龄. 中国民族史[M]. 北京: 文化学社, 1934: 3.
- [15] 吕思勉. 中国民族史[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1996.
- [16] 刘云德. 文化论纲: 一个社会学视野[M].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8: 165.